

毛泽东怎样团结各党派

□ 朱联平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制定了正确处理党派关系的成功策略，对今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批评中团结

一方面，党派之间坚持以团结为前提和目的。毛泽东强调，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对一切有意愿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如果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党内的批评就可能造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派关系上就会犯“关门主义”错误。前者如王明“左”倾路线及其肃反扩大化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后者如福建事变、两广事变曾让党的革命活动错失机遇。与此同时，西安事变前后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就形成了革命事业的利好局面。另一方面，批评是团结的手段。革命年代，党派之间的批评往往需要诉诸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斗争是批评的重要形式，毛泽东用“赶驴上山”形象比喻对待国民党蒋介石不积极抗日的行为，要前拉后推，不时地用鞭子抽两下。很多人经受不了革命的残酷性，出现革命意志倒退的倾向，就要批评，不只是诉诸言论上，更要在行动上采取强硬态度，使其不致分裂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

为了更好地运用这一策略，毛泽东提出了“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他在1957年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时认为，针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党内，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理，将这个策略和方法运用到处理党派之间关系上，也产生了良好效果，不仅没有彼此间的相互批评和互相监督引发新的矛盾，反而使同志之间关系更加和顺，党际之间各项工作更加顺利开展，目标和方向更加同心同行，革命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

警示中帮助

对其他党派进行善意的督促、提醒和引导，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对其错误甚至危险的行为给予警示，促其纠正，这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错综复杂环境下必须采取的政治策略。抗战时期，针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汪伪政府叛国投敌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军队的封锁限制等众多倒退行为，毛泽东向报界媒体发表谈话指出：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

制”。中国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不仅揭露了国民党中少数顽固分子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而且警示并教育了那些不明真相的其他中间党派及各界人士，帮助他们分清是非，认清时局，制止投降倾向。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与投降危险，毛泽东作讲演、作指示，昭告天下、警示世人，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投降分裂危险，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民主党派中的自由主义分子期望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毛泽东继续与此作斗争，澄清思想迷雾，提醒、警示他们不要心存幻想，必须“丢掉幻想”，帮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清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坚定地站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来。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各民主党派，一定要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千万不能松懈了自己的战斗意志。通过这种既警示又帮助的策略，使更多的人包括许多进步党派和民主人士走上了前途光明的正确道路，与共产党并肩一致，为新中国的建立献智献策。

互利中协商

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先进政党，善于同其他党派合作协商，做到虚怀若谷，是实现革命胜利的成功之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国民党、其他民主党派各代表所属阶级阶层的利益，同时也有各自不同的愿望与诉求。为了各自的阶级阶层利益，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互利合作中才能相处和发展。毛泽东指出：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为了维持稳定的关系，也为了相互的利益不受损害，更为了民族抗战与革命前途的发展大局，共产党坚持“互利”与“协商”的政治策略就成为维系党际健康关系的好形式。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为了避免国共之间内战再起，毛泽东冒险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成为政党之间处理国家大事的经典范例，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无畏勇气与和平建国的诚意，展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协商国家大事的政治智慧。共产党的民主作风，遇事和党外人士诚恳商量的合作态度，为政党之间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广泛沟通协商，开辟了广阔道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种基于不同政治主体的互利协商策略，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推进作用。

原则中宽容

由于不同的政党或者党派分属不同的政治主体，决定了各自不一样的组织结构、价值取向和纪律要求，承认和宽容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彼此相处的前提，同时又能够通过真诚合作而相互提携，共同进步；又因为政党是独立的政治主体，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使命目标，因而具有相应的原则边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管他们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显然是在共同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政治宽容。为了使得其他党派放心地与共产党合作共事，毛泽东同时指出：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这又是工作方式上的宽容。当然，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了宽容的策略艺术：即对于国民党的错误，一方面要尖锐地批评，另一方面还是要留有余地。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通过进一步的谈判、合作，使他们改正错误。

政党之间的宽容是讲原则的。同国民党的抗日合作谈判，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面前绝不让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显示了共产党坚持原则的钢铁意志。这个原则首先表现为双方对“纲领”的遵守，“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其次，政党之间要信守诺言，充满诚意，在互助互让中“彼此不挖墙角”。最后，还要保持政党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成功进行，在于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坚持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原则，从而起到了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坚持原则下的宽容策略，体现了毛泽东党派关系策略思想中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第一场城市攻坚战

——潍县战役胜利纪念碑碑文敬读

□ 赵泽传

潍县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华东战场上的第一场城市攻坚战，也是华东军民在转入战略反攻后取得的一场重大胜利。此役1432位指战员英勇牺牲，长眠于潍县大地。潍县战役胜利60周年时，政协第十一届潍坊市委员会倡议立碑纪念，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题写了“潍县战役胜利纪念”8个大字。纪念碑位于山东省潍坊市东风街与和平路交叉口东北约200米处，碑石为泰山原石，高11.5米，宽4.5米，厚1.7米，重138吨，纪念碑背面镌刻碑文，内容如下：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八年春，解放军山东兵团奉中央军委之命，断敌济南、青岛之援，出其不意，挥八万大军直逼潍县城下。激战一月，摧重兵，拔坚城，毛泽东主席誓之为攻坚战之范例。

潍县乃千年古邑，向为兵家所重。城分东西，隔河相望，势如犄角。西城经历代修葺，石墙高约四丈，四隅设角楼炮台，有“鲁中堡垒”之称。时国民党守军共近五万，密布工事，固守待援。守军中将司令陈金城自诩云，城防深沟高垒，金城汤池也。

四月二日，解放军对守军实施分割包围，陷城如孤岛。五日，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亲临阵前，顾东西两城西高东低、西强东弱之势，纳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之策，先取西城。

四月八日，展开外围作战。鉴城周平坦开阔，势难隐蔽前进，遂开挖掩体地道，稳打稳扎，楔入纵深，渐次肃清外围。二十三日晚，以迅雷之势强攻西城。先以重炮轰击，继而炸药爆破，致城墙裂隙，防线断开，即抢架云梯，浴血登城。将奋勇，土争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午夜，九纵七十九团率先登上城头，短兵相接，枪刺刀斫，殊死搏杀，拼命向前。一时碧血横飞，土石尽染，浩然英气贯金石而射日月。血战半日，后续部队亦先后攻入，勇猛穿插，逐巷争夺，激战一昼夜，遂下西城。

四月廿六日傍晚，乘胜进攻东城。凭高临下，一举突破城垣，风扫席卷，所向披靡。守军帅失志，将无策，土崩瓦解，如山倾水溃。次日凌晨，败走东门，解放军张网以待，聚

歼逃军，生俘陈金城。“金城汤池”终土崩瓦解。国民党山东第八区专员兼第八保安总队总队长张天佐亦毙命于城破之时。

潍县一役，地方党政组织密切配合，四万余民工亦舍身家性命支前援战。是役，共毙伤守军一万九千人，俘二万六千人，解放军亦伤亡八千余。将士英武，力克顽敌，打通胶济一线，连接胶东、渤海、鲁中三区，以光辉战例而彪炳史册。

悠悠六十余载，满目疮痍之古城早已涅槃新生，呈盛世之象。喜见鸢飞长空，城绕碧水，人沐和风而享安定。今置泰山之石为纪，以颂先烈，砺今人，更昭来者。

政协第十一届潍坊市委员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碑文生动记述了潍县战役过程意义，真实再现了敌我双方极为激烈的战斗场面，深深表达了对先烈的缅怀之情，文字简洁流畅、条理清晰，读来令人动容、催人奋进。

鲁中堡垒 金城汤池

潍县，历史悠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防工事异常坚固。县城以白浪河为界，分为东、西两城，有5座石桥相通，相距仅100多米，周围地形十分开阔。国民党在潍县构筑起半永久性防御体系，城防体系以西城为核心，由外及里设有三道防线：外围防线，城关防线，城墙防线。整个防御体系呈辐射状，延伸至三四里以外，有点有面，既可独立固守，又可相互策应。尤其是城墙防线异常坚固、复杂，城墙高13.3米，底厚8.33米，城头宽6米，能并排行驶2辆汽车。故守军自诩“潍县城防工事深沟高垒，金城汤池”。

“战必胜，攻必克，拔掉潍县这个硬钉子!”

攻打如此严密设防的城市，对华东野战军是第一次。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指示要做好充分准备，周密布置。山东兵团针对国民党军防御态势，确立了“稳打稳扎、逐次歼敌”的战法，先肃清外围，夺取城关，再攻击城池。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要求各参战部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战必



胜，攻必克，拔掉潍县这个硬钉子！4月8日傍晚，外围战正式拉开帷幕，战斗从城南远郊、城南和城北三处展开。打北官是外围战中最惨烈、最艰难的一场恶仗，主攻部队9纵26师77团共牺牲了6名营级干部。外围战斗的不断突破，不仅打掉了国民党守军各大据点，也动摇了国民党军企图长期固守的信心与决心。

4月23日傍晚，总攻开始，首先对护城壕实施爆破，接下来就是爆破城墙。我登城部队向东、西两边突击，敌人反击的非常猛烈，双方进行着艰苦的拉锯战。79团参谋长丁亚亲临战场指挥，在城头建立团临时指挥所。城上的部队被孤立 in 城头，接连打退敌人10多次反冲锋，坚守阵地长达15个小时，为后续部队跟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24日凌晨4点，为建立正面阵地，79团5连及特务连1个排，奉命下城作战，由于一时找不到工具，战士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毫不犹豫地 从15米高的内城墙上跳下，开辟了荷花湾阵地。战后79团被授予“潍县团”荣誉称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作为由100面战旗组成的方队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24日中午，73团白天强行攻城，24日晚10点左右，西城胜利解放。26日傍晚攻打东城，次日中午东城顺利解放。

经过36天的鏖战，成功攻克潍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张 婧

总结决议》，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张闻天实现了个人思想上从摒弃“左”倾到反对“左”倾的彻底转变。

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被推举作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不仅支持毛泽东，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而且密切结合当时斗争实际和广大指战员思想状况，宣传决议内容和会议精神，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维护了遵义会议的胜利成果。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这是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中发挥作用的高度评价。**审时度势，推动从内战到全面抗战的战略转变。**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张闻天作为党中央的总负责，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道，为实现从内战到全面抗战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对当时新的革命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报告、发言等方式紧锣密鼓地提出新的战略任务和策略。在瓦窑堡会议上，张闻天主持会议并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要使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地大胆地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该决议与会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折。

1936年3月，张闻天在中共中

县城，最终歼灭国民党守军4.5万余人。战役胜利后，胶东、渤海、鲁中三大解放军连成一片，济南、青岛国民党军进一步孤立。

“光荣地进去，干干净净地出来，做到军政全胜!”

为了赢取民心，确保潍县长治久安，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提出“光荣地进去，干干净净地出来，做到军政全胜”的入城要求。进驻潍县后，由于政治工作到位，部队遵纪守法，遵守城市政策，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潍县是江北著名商埠，商业繁荣，战斗过程中，有的战士鞋子跑掉了，但战士们严守纪律，没有一名战士到沿街鞋铺里去拿双鞋子穿。

中共中央以及华东局对潍坊的接管非常重视，专门设立潍坊特别市，将其作为接管大中城市的试点，并从华东局和山东各地选调了1400多名干部接管潍坊。广大接管干部团结和依靠潍坊人民，把千疮百孔的旧潍县改造建设成为蒸蒸日上、充满生机的新潍坊。更为重要的是，在潍县探索形成的一套城市接管的做法，受到中央军委高度重视，为以后攻打、接管济南、上海等大城市提供了借鉴，影响深远。

两次重大历史性转折中的张闻天

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一位重要领导人。他对党的历史上两次重大历史性转折作出了独特贡献：一是在事关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中，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二是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折中，推动了由内战向全面抗战的战略转变。

深刻反省，认识“左”倾错误思想。张闻天历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错误并坚决改正，在剖析中认真检讨过自己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负更多责任。他认为自己缺乏实际经验就需要补课，并且坚定地做下去。

1931年，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张闻天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具体工作中逐步认识到“左”倾错误的问题。面对博古、李德的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导致红军陷入被动局面的情形，张闻天开始质疑这种路线的正确性，并与之产生了思想上的分歧。特别是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对博古等人提出了批评，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打消耗战的错误做法。

鉴于第五次反“围剿”屡屡受挫、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的情况，张闻天通过观察时局，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寻找解决思路。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他从斗争实际出发，总结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法以保

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的经验，提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的重要性，预示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意图。针对各个战线敌我力量的差异，他提出了革命的长期性观点。同时，指出要想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这些观点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军事路线存在“左”的错误而要予以改变，为我们党后来提出正确的战争策略提供了有益思路。

坚持真理，促成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张闻天坚持“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长征途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从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在政治局内同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红军湘江战役遭受严重损失而博古、李德仍要坚持错误行动路线的危急关头，张闻天带头支持毛泽东关于转兵贵州的建议，使该建议在1934年12月12日的中央紧急会议上得到多数赞成而通过，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1月17日，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反报告”，这就为遵义会议作出决议之前形成了正确的导向，为会议完成预期目标提供了重要保证。张闻天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

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的经验，提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的重要性，预示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意图。针对各个战线敌我力量的差异，他提出了革命的长期性观点。同时，指出要想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这些观点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军事路线存在“左”的错误而要予以改变，为我们党后来提出正确的战争策略提供了有益思路。

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国内形势和统一战线进行了研判，分析了不同势力、派别或阶层的表现情况，明确指出建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是目前的关键。9月，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当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因而把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不适当，蒋军全部或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由此，我们党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36年12月13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大多数同志提出的“除蒋”“审蒋”主张，张闻天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应当尽量争取、分化和孤立妥协派，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和方式。1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的主张，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他对时局进行冷静分析，提出了“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的策略。此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所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两个文件。之后通过一年半之久的国共抗日合作谈判，最终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全面抗日战争的转变，开创了 中国革命和抗日斗争的新局面。